

万航渡路上有个中行别业,离静安寺不过一站公交车的距离。这是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弄堂,说是弄堂却又与上海别的弄堂不一样,弄口开阔大气,临街的弄堂两侧一边是红宝石面包店,一边是雷允上药店。延伸到两侧的店铺一家连着一家,都是开门七件事少不了的市井小店,其中不乏老字号名店,琳琅满目的店铺使这一带热闹繁荣,把人间烟火气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

曹家渡旧景

中行别业原系中国银行职员和家属的集体宿舍。它是上海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社区概念的生活小区。名字里的“中行”是中国银行的简称,“业”字包含着事业与家业两层意思,事业是指行员在中国银行的工作,家业是指工作之外的家庭生活,而中行别业就是行员们经营家庭生活的所在,为区别于事业场所故称为“别业”。在这种理念下营造的中行别业从设计建造到生活起居,都看重家庭和生活的概念,完全没有华丽和炫耀的追求。中行别业内没有独栋别墅,多的是一家挨着一家,一户连着一户的三层小楼,有点像联排别墅。就连建造较晚的供九位副行长居住的“九幢楼”也是连体的。因中行别业的房屋分批而建,有花园、公寓等不同形式的造型和不同标准的生活设施,故而当时是按照职员的职务高低分类居住。中行别业建筑风格多样,组合排列、和谐毗连,有新老公寓、单幢房、新工房等。栋与栋之间错落零星地布置着大小不同的绿化。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,有的高大宽敞,有的精致实用,在同一个小区里,多种形式、多种风格的房屋聚在一起,其内部格局在上海的住宅中可算别具一格。

滂沱大雨下催生的住宅群

中行别业的建造缘起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首任总经理宋汉章。在中行别业流传着一段佳话: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代初,一位中行青年职员病逝,这位中行老员工家境拮据,一家四口蜗居在上海一个石库门楼下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客堂间内。为了替老员工停放灵柩,家人不得不拆去家中床铺。由于居室实在太逼仄,老员工的灵床头顶着灵桌,脚顶着靠近天井的长落地窗,致使落地窗的门都无法关上。那天正好天降滂沱大雨,从窗外飘入的雨水将老员工的一双寿鞋都浇得湿透了。前往吊唁的宋汉章见状心里十分难过,此时,他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,那就是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的优质住宅。1923年10月31日,由宋汉章提出,经常务董事会讨论通过,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,选址万航渡路



私家地理

万航渡路上的中行别业

地起造中行别业。

中行别业始建于1923年10月31日,于1924年落成。其中最早的建筑群为四层大楼式公寓和家属宿舍。大楼式公寓与周围三层家属宿舍形成四合院式建筑,通称“老房子”。这个公寓有点类似今日的会所性质:一楼为大礼堂;二楼为免费员工子弟小学;三楼、四楼为单人宿舍,供未婚员工住宿。家属宿舍为三层楼,七排(幢)房屋,53个单元,老房子住宅外墙均为砖砌清水墙,门窗均为木质。分单开间和双开间两种,前者供一般行员家属居住,后者供主任、襄理及其家属居住。这是中国银行最早一代老职员的住宅。小区内设有供销社、图书馆、理发室、联合诊所、老虎灶、大饼油条点心店等生活设施,另有网球场、乒乓球室、篮球场等,俨然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小型社区。这是国内风格的房屋聚在一起,其内部格局在上海的住宅中可算别具一格。

1929年,中国银行将中行别业南面一块空地购入,建造连接式花园房屋一排,共九个单元,俗称“九幢楼”,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、襄理住宅。9幢楼前有1000余平方米的长方形绿地,每幢楼均可从一楼客厅开门进入绿地。上海著名作家茅盾乃孺的祖父是中国银行高管,曾居住9幢楼内。9幢楼初期每个门洞一户人家,共三层,后来改建加了一层变为四层。随着员工人数的递增,中行别业也不断扩建。1934年,在“老房子”后面陆续增建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屋八排,42个单元,称为“新单幢”,就是当时的独栋别墅,一户一幢,煤气、水汀、壁橱、打蜡柚木地板,供主任级行员及其家属居住;混合结构四层楼公寓六排,12个单元和四层楼单身宿舍一排,三个单元,称为“老公寓”。一梯两户,房型宽敞。到1934年建造的六幢四层楼公寓式住宅,已可与租界区的公寓媲美,煤气、水汀、壁橱、打蜡柚木地板样样俱全。因为此时中行的员工队伍已有很大的变化。中行别

业也与时俱进,兴建起一批批新颖的公寓房子。随着多批房屋的竣工建成,中国银行的行员入住率极高,下至普通行员,上至襄理、经理,都居住在有着明确职位区分、风格变化多样的各式房屋之中。

以理想的社区为设计蓝本

中行别业的设计是以建设一个理想社区而建造的,在中行别业内,各类生活配套、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里弄只有一个大门,入口居中位置的四层大楼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子弟小学——中振小学。这里不仅是许多中行行员子女学校教育的起点,还是居民欢聚的场所。大楼正南面有宽敞的台阶,台阶下是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泥地广场,白天作为学校和职工家属活动的场地,晚上停放银行接送员工上下班的班车,小学里的文艺活动,如会操汇演、合唱舞蹈等在这里举行,每逢周末和节假日,大礼堂内都会举办规模盛大的同乐会舞会,居民们还相约在这里排练话剧,排练好后在外滩23号中国银行礼堂的大舞台上演出。底楼还配有弹子房、乒乓球室,供行员们在晚间娱乐,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。浓郁的艺术氛围培养出了画家、舞蹈家等,上海译制厂的配音演员倪康、施勇就曾是中行别业的住户。此外,中行别业还有游泳池、医疗卫生所、篮球场、俱乐部、小卖部等各类设施。中行别业内的职工和家属享受着看病免费、读小学免费等优待,职工子女上中学大学甚至留学,都可向中国银行申请无息借贷。小区门口每天还有班车准时接送员工上下班,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非常罕见的。因此,中行别业内父子、叔侄两代共同服务中国银行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整个中行别业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。同事加邻居,邻里关系和睦如一家。当年,中行别业流传着一句话,那就是:“进了中行,只要认真真,勤勤恳恳一世,小康生活总可以保证。”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,日本侵略军进入租界,中国银行被日本侵略军接管。中行别业内顿时阴云沉沉。当年中行别业的门牌号为极司非尔路96号,这里与极司非尔路76号的汪伪特务机关近在咫尺,因与魔窟为邻,中行别业内的居民日夜提心吊胆,他们平时出入宁愿穿马路绕道走,也不愿走过“76号”门口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中国银行百废待兴,开始重振江山。大批原来随中国银行迁移至重庆、昆明等地的员工陆续返沪,宿舍已不能满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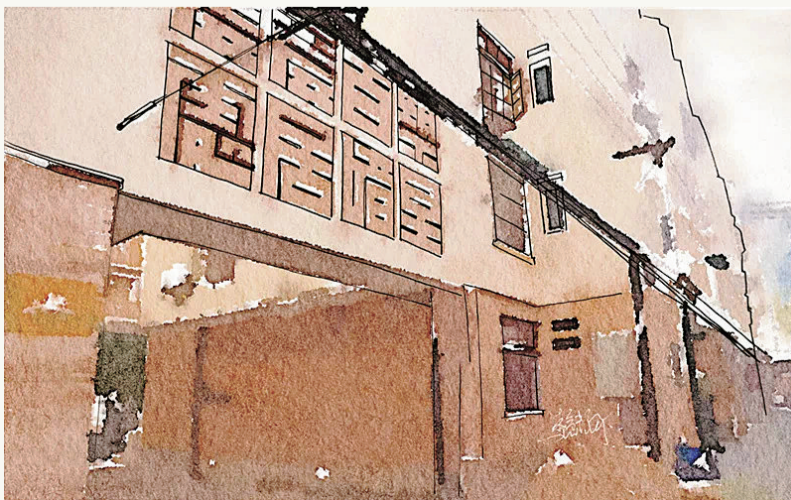
行员及其家属所需,于是,中行别业小区于1946年拆除了原74号,重建了一批混合结构的五层楼公寓两排10个单元,一梯两户,每户三房,称为“新公寓”,当年这批楼号称上海沪西地区最高的住宅楼房,在屋顶平台上可以直接看见外滩的大楼。由“新公寓”围合起来的大院中间是一个圆形水池,水池中立着一尊石雕的海豹,嘴巴里会定时喷出水流,这个围合起来的院子便被称为“海豹圈”,是中行别业的孩子最喜欢去的嬉戏地。

欢欣雀跃迎来上海解放

1949年5月25日清晨,人民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上海市民宣告上海(苏州河以南)已经解放,中行别业内的居民顿时欢欣雀跃,奔走相告。当日,中行别业里的积极分子将预先购置好的两条各长30米的白布平铺在中行别业新公寓的大草坪上,由擅长书法的中行别业居民叶子圣在上面分别写上“庆祝大上海解放”和“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大字,每个字约三米见方。写完等墨汁收干后,又用大篷车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两条标语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,这时,苏州河畔的外白渡桥还在激战,流弹横飞,枪声不断。高悬在中行大楼上的这两条大标语,成为解放上海时外滩最早高悬的巨幅标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行别业的老房子进行过拆除重建,并在小区大门口沿万航渡路新建六层新公寓四幢,共有二至五层楼房140套,俗称“新公寓”。斑驳沧桑的房屋外墙也换上了鲜亮的外衣;年久失修的游泳池也已被生机勃勃的绿地所取代。近年来,中行小区健身苑也悄然建成,曾经的“海豹圈”变成了供居民纳凉的凉亭,时常可以见到棋友们在此切磋棋艺。在“新公寓”71号和72号的过道上方,南北两面各镶了八个水泥大字,北向写着“筑室百堵,爱居爱处”,南向写着“殖殖其庭,君子攸宁”,这四句出自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斯干》篇的名言佳句,赋予了中行别业独特的内涵。这几个古老的文字与现在和谐社会理念不谋而合。

像中行别业这样以社区概念规划,由中国银行自己设计建造的带有多功能内容的社区,又有各种不同建筑物构成不同级别职工混合居住的大型里弄,同时,还有大量绿地,环境幽静,生活设施齐全,当年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一个。它超越了那个年代民众认知的社区里弄概念,在上海历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笔。



旅人走笔

居平

九如巷

假期,随先生去他的老家镇江探看九如巷。百转千回的九如巷,总是让他心心念念,那儿有百岁老爷爷留下的百年祖屋。

先生的百岁老爷爷曾经住在镇江九如巷好多年,上世纪三十年代携妻儿在上海开中医诊所。镇江九如巷、同鑫里都在宝塔路以西,大西路以南。南至宝塔路横街,北至大西路,巷内有二十多条小巷相互贯通,主巷长大约二百多米,宽近二米。

游览南山后,我们又去九如巷探看老屋,同鑫里等街巷,才知道九如巷的来龙去脉。何为“九如”?这是源自诗经《小雅·天保》:“天保定尔,以莫不兴。如山如阜,如冈如陵,如川之方至,以莫不增……如月之恒,如日之升,如南山之寿,不稂不莠,如松柏之茂,无不尔或承”。这意思是说,“上天保佑你安定,江山稳固又太平。给你待遇确实厚,一切福分都赐尽。使你得益又多,没有东西不丰盛。上天保佑你安定,降你福禄与太平。一切称心又如愿,接受天赐数不清。给你远处的福分,唯恐每天缺零星。上天保佑你安定,没有事业不振兴。上天恩情如山岭,上天恩情如丘陵,恩情如潮忽然至,一切增多真幸运……你像上弦月渐满,又像太阳正东升,你像南山寿无穷,江山万年不亏崩。你像松柏长青茂盛,子孙孙相传承。”这原是在民间乐歌基础上,为朝廷祀典所作的祭歌。

当时,生意人最盼望的是生意兴隆,这“九如”的诗词真是大吉利,于是“九如巷”地名在1929年以后应运而生,大批富豪在这里圈地建房,紧邻的薛家巷也是富人聚居地,当时民间有“金九如、银薛家”的民谚,许多成功的商人在此盖了豪宅,老爷爷的三兄弟也从扬州迁居到镇江九如巷,买下了九如巷30号的三合院,爷爷许亚轩师从扬州江都名医张明贤,迁居九如巷后,就在九如巷30号开诊,悬壶济世,治病救人,医德高尚,医术高明,听老邻居讲,爷爷为人和善,为穷人看病从不收诊费,留下了一段佳话。世事沧桑,现在只剩下百岁老

新书速递

潘真

《汲古斋传奇》背后

大学毕业到报社没几年,我就开始采访名家,多为文化名人,偶尔是科学大家,直到今天还乐此不疲。

此前出的书,有散文、有评论,也有几本人物传记。可从来没想过,会有一天为“这一个”名人写传。虽然,传主杨晋新说,25年前在报上读过我的一长一短两篇人物稿,就预约了这本书。当时在场的记者同行提醒我,杨的原话是“我以后要写传记,作者非潘真莫属”。

25年后,终于接下这个任务,是因为想挑战一下自己:看能不能写好一位草根名人。把这个私心说出来,传主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,直到我说“你我也是草根,小人物呀”。

Nobody(小人物)是我常用的单词。没人关注、无拘无束、闷声不响做自己喜欢的事,正是我感觉最舒服的状态。Somebody(大人物)是传主心目中的自我,天天生活在舞台上、聚光灯下,振臂一呼,引人注目,被人崇拜……

按以往的经验,我写传记的流程是,采访结束开篇,写完一章让传主过目、讨论、修改、补充,接着写下一章……可是,这一本,绝对不敢如此操作。传主是“微信控”,每天事无巨细都要拍个照晒出去,晒上十几条。我最初的一些采访活动,都不幸被这样曝光了。因为有共同的朋友,很快收到一些反馈。而我交往的朋友,无论籍贯、出生地,多为“精神上海人”。可想而知,那些曝光引来的严厉批评:为什么普通的采访要广而告之?为什么书还没出就如此高调?多写点有意思的散文不好吗?拍坏的形象怎么也被乱晒出来?

我对传主说,我们上海人凡事喜欢“不响”,和你这“东北人”(他曾在黑龙江插队10年)不一样,请你理解。他却不以以为然,说写传记就是为了让大家认识他。我说,那也没必要让大家天天看见我呀。他不管,继续我行我素。好在,我及时躲开了镜头,有时索性充当他们的摄影师,顺便以自己的出品默默教导传主:怎样

拍好人像、合影,拍得不灵秒删以藏(你的)拙。在十几次对传主的儿时伙伴、插兄、原单位同事的群访之后,才定下出版社。资深编辑审时度势,权衡利弊、三方商讨、斟酌之后,传记的重心被改为传主与汲古斋画廊事业,遂有了现在的书名《汲古斋传奇》。这就意味着,前期的采访几乎都写不进这本书里了。而直到交稿前几天,我还在补充访谈与汲古斋相关的艺术家。

当然,所下的功夫不会白费。至少,那一系列群访,使我粗浅了解了平时没有机会接触的一些阶层,就算补上社会学的一课吧。有次采访,听说早期汲古斋元宵笔会上,刘一闻先生的对子写得飞起来。有买家请他落款,上款也是名头相当的大名家。在笔会上低价收进,两个大名头就很容易高价卖出。这生意经,太绝!

忽然发现,在整个采访过程中,我的角色始终是“作者+泼冷水者”,督促传主在一片扬扬声中,冷静冷静再冷静,以便朝着大方向的方向继续前行。作家同行赞道:如此作传,态度不错哦!不仰视,才不会过誉,才真实可信。这样的传记写作者,借用政协的术语,称得上“诤友”了!

目前,“于氏故居”正在保护修缮中。同鑫里的地名是因为李、于、张三姓商人在此建房,而取名同鑫里,含有共同富裕、共同发展的寓意。民国时期,许多人崇尚“抱团取暖”“邻居好赛金宝”。人以群分,文人、有钱人喜欢选择居住在一起,并兴起“生活小区”的概念,“里”“新村”成为时尚,许多地名并没有什么深的文化内涵,就是吉祥语或者典籍里的句子。同鑫里是九如巷里的巷中巷,它独立取名,体现出当时的一种潮流。

据介绍,同鑫里7号“于氏民居”就是“人民教育家”于漪先生的老宅,1929年,于漪出生在这里,在这度过了美好温馨的童年时光,她就在附近的薛家巷小学就读。据于漪先生回忆,读到三年级时,家乡沦陷,学校解散,正是音乐老师最后一堂课教唱的《苏武牧羊》,成为她生命成长的基因之一,歌词与曲调影响了她一辈子。

绵长岁月,故事悠悠。如今,居住在九如巷、同鑫里的大多是老人,听他们讲述百余年前传承下来渐行渐远的故事,感慨万千。

